

中國需要新智慧走向新世紀

五十歲了，對個人來說，已經步入中年，用台港報章的社會新聞標題來說，是「半百老翁」了。但對一個國家來說，則又是相對地年輕；漢朝和唐朝都在五十歲以後才慢慢走向富強，美國更是在八十多歲時打了一場慘烈內戰後，才解決國家認同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歲的生日是如何回顧與前瞻？這政權的命運是否面對能不能「永續經營」的挑戰？會不會走向中國傳統朝代興盛衰落的歷史循環？甚至像前蘇聯那樣一夕間被「移形换位」地解體？

對全球華人來說，近五十年的中國是一個奇異的綜合體，它是令人興奮與哀愁的綜合體，既一舉消除了百年帝國主義欺凌所帶來的屈辱，但又陷入自我毀滅式的種種內耗，從「反右」到「文革」，血跡斑斑，並在過去二十年改革的道路上，交了不少昂貴的學費。

但新世紀的時代呼喚也帶來新的憧憬與憂慮，到底今後五十年或是今後十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面對甚麼轉折？中國的未來是否仍然有跡可尋，可以找到機遇與挑戰的軌跡？

中國當前其實面對內部關係與外部關係密切互動的新時期，新科技及互聯網絡已迫使中國沒有選擇，必須進入一個訊息疆界日漸消失的世界，這是新的「球籍」。到二〇〇三年，中國的互聯網用戶估計將從目前的四百萬戶跳升至一千二百萬戶以上，進入訊息年代，也等於與國際價值接軌。

「媒介就是訊息」，中國社會與國際社會的差距加速縮小，中國與國際間的訊息交流與生活的基本價值的融合，也將出現新的高峰。

其實近幾年中國大陸與台港及其他華人社會的文化融合，已打破了種種框框，作家白先勇在最近亞洲週刊的專訪中即表示，台北的永和豆漿與張惠妹的歌聲，早已使兩岸中國人距離拉近；更奇異的是，透過中國民間廣大的盜版網，加上影音光碟機等電器產品價格日趨下降，中國民眾往往與西方觀眾同步觀賞電影《鐵達尼號》等西方流行文化產品。

這是無所逃於天地的全球化浪潮。這幾天在上海舉行的「財富五百論壇」，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即指出，中國仍可在今年加入世貿組織。中國經濟體系從國企下崗工人到「大款」企業家，都將受影響，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爭辯很多，但這是未來十年的總趨勢。中國決策者可以不在今年或明年加入世貿，但權衡輕重，為總體國家利益計，進入國際經濟體系軌跡已是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中國所能選擇的也許只是速度，而不是方向。

互聯網世界和世貿組織等方向已是難以逆轉的方向，不管你愛不愛，只要打開了國門，就要往這個方向走，但北京當局希望可以控制速度，可以「微調」。也就是說，中國改革的列車必須走上全球化的開放通路，但時速多少才能安穩可靠，不會引起發動機過熱，更不會車毀人亡，就有待駕駛者的智慧與判斷。

內部改革的速度，也取決於外部關係的變化，其中最大的變數在於兩岸關係。台海戰爭會不會打，怎樣打，都影響中國未來半世紀的命運，最近五年兩岸關係惡化，已在世紀末升至高潮。尤其自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之後，北京高層似乎第一次感覺到台海之戰可能難以避免，因此在軍備及策略上都作出調整。更嚴峻的問題是，台海戰爭一旦爆發，中國陷入第二次內戰的火海，將帶來非常凶險的變數，因為台灣的軍事反應絕不會束手就擒，而是會將戰場殺至中國大陸，沿海城市三十多年以來首次暴露在硝煙的陰影中，這也使中國現代化進程陷入危疑的陰影中。

即使對台用兵獲勝，也可能會使北京陷入新的危機，因為贏了戰爭而不能贏得民心，將使台灣局勢難以控制，台灣積聚的民怨甚至可能會滲進大陸。北京領導人對此自然有所警惕，因而不會輕率用兵。

不過，北京對外的世界觀，在世紀末出現微妙的變化。今年五月七日北約導彈誤炸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事件，不僅引起中國民間反美示威的浪潮，更衝擊中國領導層，深刻體會「落後就會挨打，尊嚴來自實力」的硬道理。但中國當局了解，導彈只是轟掉中國一些親美心態，卻轟不掉改革開放的決心。真正的考驗，還在於如何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使中國能有建設及累積國力的條件。

當然，中國的變革不僅是由北京高層所主導，也是由很多新生的社會力所推動。由於進入了市場經濟，社會上的資源不再是由黨與政府所壟斷，民間企業及各種利益集團逐漸形成，它們在不同領域中開始展現實力，與政府當局既聯合也有矛盾，當局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發揮「指令」作用，而必須兼顧不同利益集團的平衡。北京近月來與美國在世貿的談判上，就展現內部不同政府部門與利益集團的歧見，不能「一刀切」地定奪。

經濟改革的核心，已經不再是簡單地將國有企業全面民營化的問題，而是要注意轉軌過程及轉軌之後的品質。這不僅繫乎民營化企業的生產力，更觸及資源適當分配的社會公正問題。因此經濟改革及邁向市場經濟之際，如何安頓數以千萬計的下崗工人，既是一個標榜社會主義國家的道德包袱，更是避免社會出現動亂的現實考慮。穩定壓倒一切，經濟轉軌的成果若以不穩定作為代價，對中國的前景勢將投下負面變數。

貧富懸殊與地區差距兩大問題也開始浮現，全國逾八成以上的財富掌握在不到兩成的人手上。當然，用鄧小平的名言來說，本來是要讓部份人先富起來，但也別忘了鄧小平還加上了一句，貧富懸殊的問題，必須要在下世紀初解決。如今在新世紀的門檻上，中國有解決貧富懸殊的智慧嗎？並且弔詭的情境是，會不會減少了貧富懸殊，又使中國走上平均主義老路，挫敗了企業家創業的積極性，也拉住市場經濟發展的後腿？另一方面，這種恐懼又會不會使某些既得利益者或權錢交易的貪污腐敗者，以此為藉口來反對任何降低貧富

懸殊的措施？

這也正是中國在未來十年必須解決的兩難局面，當局必須開拓新的思路，來解決這些古老但也日日新的「悖論」。同樣的，在日漸擴大的地區差距中，中國當局及民間的力量是否有新的智慧來解決問題，亦即兩者是否能進入「雙贏局面」，而不是以損害沿海省份的代價來支援內陸偏遠的窮困地區？

社會不穩定的另一個亂源，是貪污腐敗的擴大化，尤其是制度性腐敗，已經不是個人道德的考驗，而是整個政治系統的疏漏。這立刻牽涉到政治改革的問題；長期以來在海內外流行一種意見，認為中國立即實行多黨政治，就會解決腐敗。但這答案顯然不全面，證諸菲律賓、印度及俄羅斯，多黨制並沒有提供消滅腐敗的機制，而只是提供一個新的遊戲規則來創造新的腐敗。問題的關鍵顯然是有效與高品質的制衡，並且立刻連繫法律的改革，解決「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被西方媒體視為獨裁的新加坡，長期以來是一黨獨大，但在法治的制衡及清廉的政治文化下，消滅腐敗的績效還勝過大部分西方國家。

這其實也是對中國共產黨的嚴峻考驗，這個中國的執政黨在建政五十年之際，是否會有新的智慧來走向下一個五十年，為新世紀的中國人創造輝煌？列寧說，攻陷堡壘的最好方法是從內部進攻，中國共產黨近年內部的腐敗，的確成為社會腐敗的先鋒隊。在未來的歲月中，中共是否可以同新加坡的執政黨看齊，在制度及文化的兩個層面中根除腐敗？中國未來的希望在於體制內的改革。只有體制內的改革成功，才能有效回應體制外的挑戰。新世紀的中國需要新的智慧，才能創造一個真正沒有血淚的新中國。